

民初广东警界陈景华简介

潘向泐 郑 芸

(广东警官学院图书馆 广东 广州 510050)

1913年9月15日晚上,军阀龙济光以中秋赏月为名邀请广东首任警察厅厅长陈景华到都督府,向陈景华出示袁世凯的密杀电令。陈景华不予置辩,从容就义。^[1]陈景华从任职到牺牲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执法如山,戡乱安良,在广东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成为广东警察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一、从前清干吏到民主革命斗士

陈景华(1865-1913),广东香山南屏(现珠海)人。1895年春入京会试,领衔呈递有289人签名的《广东举人陈景华等呈文》,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曾任广西多地知县,官声清著。在知县任上,经常短衣草鞋,持手枪率差役追捕盗匪;对于士绅、官员要求“保释”的一概回绝。因此,他所治理的县份治安状况迅速好转,他本人也被誉为广西的“治盗能员”。1903年,陈景华因处决一名大盗而得罪两广总督,结果被抓进号子。^[2]后在好友帮助下逃到暹罗(今泰国),1908年与萧佛成办报《华暹日报》宣传革命,并担任同盟会暹罗分会书记。

二、推动广东和平光复,就任警察厅厅长

1909年,同盟会会员、暹罗侨商马兴顺回潮州,被保皇派告密入狱,陈景华回香港营救。1910年,陈景华从暹罗回到香港,在韦宝珊洋行里当买办,暗中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会员潘达微、邓慕韩等通过原两广总督张鸣岐向清廷奏请特赦汪精卫与陈景华,让他们回广州主持政局。11月9日,各界代表数千人在广东集会,与会者一致推举陈景华担任大会主席。在陈景华主持下,各界代表宣布广东脱离清王朝独立,欢迎革命党人来组织共和政府。大会推选胡汉民为大都督,胡汉民就任广东省都督后,对陈景华的才干与魄力十分赏识,先后委之以民政部长与警察厅长重任。

三、铁腕戡乱,除暴安良,成为民初警界的治世奇才

陈景华上任后坚决执行军政府清除赌博、盗匪、会党、械斗四害的政策。1912年8月颁发严禁赌博令。是年,军政府下令“一年内禁绝鸦片”。^[3]对各种抢劫、盗窃的罪犯,他严加缉捕,明查暗访,亲自审讯判决。另一方面,陈景华也十分同情下层民众的疾苦,他积极执行孙中山解放奴婢、仆役等政策。他严厉查处拐带青年妇女出洋的案件,使案犯受到应得的惩罚。他在广州的黄大仙祠创立了女子教育院,收容现受虐待的婢女、妾侍、童养媳、尼姑、雏妓。被收容的女子不仅得到食物衣服和治疗方面的帮助,还可以在院内学习文化技艺。孙中山为此亲题“广东公立女子教育院义举也,书此为人道主义倡。”以示褒奖。^[4]在他的铁腕治理和柔情安抚下,广州

城的治安很快有了好转。

陈景华的另一贡献是完善了广东的近代警察制度,近代警察制度产生于清末,但清朝的警政腐败到极点,警察维持治安不力,扰民害民之事层出不穷。陈景华设法尽可能改善警察的装备,加强对警察的训练,提高警察的士气,淘汰不合格的警员,明确各级警员职责,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引进指纹侦查的科学破案方法,切实加强了对警员考察监督,对贪污害民的警察严惩不贷。他反对清朝官吏那种因循拖沓的作风,办事雷厉风行,他常常亲自办案,很多公文也是亲自拟稿。在他的努力下,警察厅成为民国初年广东最有办事效率的机构。

四、雷庭治世惹争议,清廉一生载史册

陈景华铁腕治世的做法,受到百姓的广泛赞誉,但也因此得罪不少人,一些做法也为部分文人所诟病。景华曾在布告中有“景华以杀人著,勿谓言之不先也”之语,本意让民众严守法令,他却因此被传为喜欢滥杀的酷吏。就连被龙济光诱杀一事,也有人评为“以暴制暴,看似有力量,终究是文明的困境”。^[5]陈景华死后身无余财,可见其为官之清廉,因开罪人多甚至棺材铺的老板不愿意卖棺材给陈家。陈景华的好友,曾殓葬黄花岗烈士的革命党人潘达微,为陈景华墓碑写下这样的铭文:“强项之令,猛以济宽。冤同三字,狱等覆盆。盖棺论定,毅力维新。哀我国民,丧此良人。”

作为民初广东首任警察厅厅长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杰出斗士,陈景华的人生经充满传奇。

参考文献:

- [1]广东省地方志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公安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 [2]赵立人,秋风.岭南奇侠陈景华.神州民俗:岭南纪事.2008(5)
 - [3]广东省作家协会.辛亥风云人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 [4]清末民国广东警察实录.羊城晚报.2010年9月4日.
 - [5]广东民国史研究会.广东民国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 基金项目:论文系广东2015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公安志特色资源建设——以广州警察史研究为例》、广东省社会管理局2014年资助课题GDSHTWXKT1、广东警官学院重点课题《公安志文献建设与学术价值探讨:以广东警察史研究为例》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潘向泐(1969-)广东警官学院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文献资源建设。郑芸(1982-)广东警官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信息资源检索。

(上接第211页)而情,不能治生,不乐作苦,虽芸众犹昔,然行尸走肉,无所取材,然则佃治草昧,澄清全地者,舍我黄人末由也。”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不仅无可亡之理,而且有必强之道——人才与人力。于人才,梁启超如是论道:“有才千人,国可以立;有才万人,国可以强。今夫以中国之大,种类之美,教俗之善,欲求于四万人中而得一,殆匪日难也。”于人力,梁启超认为,华工为天下最廉之劳力,假以时日:“举天下之器物,皆仰于华民之手,欲华种之无强,不可得也”。此外,为了论证中国之将强,梁启超竟然连气运之说也用了。梁启超千方百计意欲证明的是:中国必强;然而,纵然他有理论千万,也始终改变不了这一事实:中国依旧极弱,而且自强之期遥遥。梁启超先是意欲变法自强,然而却惨然失败;其后,他又醉心学术,希望寻求一条救亡图存之路,最后却无果而终。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让梁启超难免走上极端。其于中国求富之道有一种见

解:“使举国之人,皆为生利之人,而无分利之人;使举国之事业,皆为生利之事业,而无分利之事业”。这恰见当时梁启超彷徨之心境。

总的说来,中国的自强,不单单是改革与革命的问题。改革与革命固然需要权衡,然而其中错综复杂的诸多细节才是关键。若是革命,那革命该由谁来领导?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少?中国会不会重蹈法兰西和南美的覆辙?革命后当如何建设?是否需要全盘西化?若是改革,当如何下手?旧政府旧官僚当如何处置?改革步伐当急还是缓?如此种种才是中国知识分子彷徨之所在。梁启超于此也有诸多疑问。比如,在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梁启超前后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前期,他意欲移植西方文化于中国,妄图重塑一种新道德;后期,他又主张依靠中国旧文化改良出一种新道德。然而,面对盘根错节的种种问题,梁启超更多的还是手足无措。也正因此,他才难免有快刀斩乱麻的想法,从而走向极端。